

到底誰學誰呀？閒聊清初的「西學中源說」

祝平一研究員（歷史語言研究所）

魯迅在1925年寫了一篇〈論他媽的！〉。他說：「無論是誰，只要在中國過活，便總得常聽到「他媽的」。...這話的分布，大概就跟著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；使用的遍數，怕也未必比客氣的「您好呀」會更少。...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「國罵」了。...國罵之博大而精微：上溯祖宗，旁連姊妹，下遞子孫，普及同性...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，卻去瞄準他的血統...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，無論如何，總是卑劣的事。」也許是因為論戰文章，或因為不證自明，魯迅未曾深究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」的策略，為何能奏效。中國是個敬宗法祖的文明，個人和祖先間的距離界定了人群階序，授予尊長權威。能跨越祖源，直接混亂血緣的秩序，自然成為顛覆他人權威的阿Q勝利法。

然而，並不是只有中國人使用這個策略。二十世紀初，中國文明西來說的爭議便是在西方優越感下的學術產物。雖然其背後的邏輯相當不同，但是《聖經》中人類同出一源的歷史心態，使得當時西方學者在帝國主義不斷擴張的歷史背景下，以文化傳播論，解釋不同文明的進程，合理化西方的啟蒙使命。在科學方面，最有名的便是「中國沒有科學」或是「為何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？」的陳述。

雖然西方早有「科學」一詞，但我們現在所熟悉的西式科學，大約要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存在。中國則在二十世紀初才從日本輸入「科學」這個詞，「科學家」的身份也在此時誕生。因此，中國的確是沒有「科學」。但這不是重點，因為該陳述主要的指涉是「中國落後西方」。但如果承認天文學是科學的一支，許多清代學者卻認為西方天文學起源自中國。那麼按照「他媽的」邏輯，西方曆法是否落後於中國？這個有點複雜的問題，現代學者將之稱為「西學中源」。

曆法是中國皇帝之所以「天子」最重要的象徵。為了證明他秉承天命，每當建立新皇朝，便頒佈新曆，象徵上天對該王朝的祝福；而曆法失準則往往被認為是上天的警示。明朝（1368-1644）亦不例外，但到了十五世紀中葉，明朝的曆法已經有明顯的誤差，欽天監的官員卻無能校正。

十六世紀末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，抓住了朝廷改曆的需求，企圖進宮，從上而下傳教。明朝最後一位崇禎皇帝即位之時，外有滿人，內有流寇，侵蝕著明王朝的天命。崇禎皇帝決心改曆，在徐光啟（1562-1633）的引介下，傳教士入宮為明朝編製曆書。諷刺的是，崇禎改曆卻仿如為滿洲人的天命背書，不久便為征服大明的清人所用。我們現在所用的農曆基本上便是由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所制訂。

清朝的曆法和曆書，形式雖然不變，但卻使用西方的曆法觀念和技術。一旦歐洲的曆算系統為皇帝所採用，便意謂著傳教士可藉壟斷天文知識，建立在宮中

的據點。湯若望深諳此理，建了很多關卡，以保西法的優勢。為了取信滿洲皇帝和中國士人，湯若望在1646年便提出了「就中曆而論，其根亦本于西。」由於中法源於西法，湯若望提議只要學習西法便可。

然而許多漢人學者卻懷疑西洋人的技術可能源自中國，像回歸年長度等參數、歲差、乃至定氣法，中國古代的曆家都己知道。因此，他們認為西洋曆法，只是中國的改良版。尤其當這些話出自像黃宗羲(1610-1695)、方以智(1611-1671)、王錫闡(1628-1682)、王夫之(1619-1692)等遺民之口時，便產生「他媽的」效應。仿佛暗示著西洋人以及使用蠻夷之法的清帝國，只是居於中國下流的產物。

1664年，楊光先(1597-1669)狀告傳教士假曆法以傳教，實藏背反之心。當時欽天監一位奉教官員李祖白宣揚人類乃亞當與夏娃的後裔，同出一源。楊光先怒斥其中「他媽的」意涵，認為李祖白誣指「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裔，《六經》、《四書》是邪教之微言。」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楊光先成功地使西法中挫、傳教士下獄。但1665年初一系列的天變和地震，卻使傳教士們意外獲赦，撿回一命。楊光先雖不會曆法，卻成功地取代了湯若望。那一年，康熙皇帝才十一歲，權力握於以鼇拜為首的輔政大臣之手。康熙於1667年親政後，發現楊光先雖然想恢復所謂的「古法」，卻無能解決曆法失準的問題，他因此親自安排了雙方比測日影。在比賽中勝出的西法，此後成為清朝的正統曆法。

楊光先一案在康熙心中留下了一道深長的陰影，他曾告誡子孫必須習曆，才不會被人給矇了。1704年，康熙寫了一篇〈三角形推算法論〉，提到在曆法爭議中，「舉朝無有知曆者。朕目覩其事，心中痛恨。」他承認西方曆法源自中國，但那又怎樣？他憤慨地說，西洋人不斷地測量、改進，使其曆法更加精良。漢人呢？他們只想考試當官，逼得他得「幾暇格物」，學習曆算。他還指責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曆算家一行(683-727)與郭守敬(1231-1316)不過就是襲抄回回曆。曆法可驗於天，人所共見，源、流之爭，根本不是「他媽的」問題。

康熙表態後，漢人算家只得「伏讀」聖裁，配合演出。1705年康熙在御舟召見一介布衣梅文鼎(1633-1721)，兩人一連三天談論曆算。回去後，梅文鼎只得苦思中西曆算源流的問題，並發明了清代最廣為人知的「西學中源說」的版本。他引用大量文獻，解釋每當中國政治動亂時，逃難的曆法家便將中國曆法播散四方。由於中國西部沒有地理上的阻隔，因此日官可以不斷地往西走，曆法也因而不斷地往西傳播。所以佛教、回回與耶穌教所用的曆法都源自中國，只是為了配合各地之信仰，設定不同齋日，訂定了不同的曆法。但這些曆法出於中國是不爭的「歷史事實」。梅氏宣稱所有的曆法中，只有中國式的陰陽合曆諧於「自然」。此乃因西法雖也在無中氣月置閏，但因太

陽行速不均，可能一年有兩個無中氣月，或是一月有三個節氣的例外。置閏規則變得複雜，便只能仰賴欽天監西方專家的判斷。梅文鼎因此認為中國仍應維持其曆法正朔，使用平氣法（即將歲實均分為二十四節氣）置閏。為了迴護中國的曆法傳統以及正朔之義，梅文鼎甚至說曆法會不斷進步，不必汲汲於測蝕之毫秒無差。何況天行複雜，亦非儀器能完全掌握。重要的是要從觀測中累積資料，以修訂曆法常數，不時更新；不當因一時失準，修改成憲。當然，這也適用於今曆，他無意挑戰現時曆法的合法性，卻建議維持古法的正朔。

「西學中源說」是由「中 / 西、源 / 流、同 / 異」等一系列對稱概念所構成，其所欲襯托者乃隱而難言的「優 / 劣」這組概念。中、西曆法類同處，是同源的證據；而差異雖是各自的創發，但卻有優、劣之別。同是「西學中源說」，意義卻隨論者的政治立場而異。湯若望以中曆西源，強調西法的優越。明遺民則以「西學中源」反擊，質疑西法不過是中法之流亞。康熙雖也接受「西學中源說」中一系列對稱性的概念，但他卻倒轉了「優 / 劣」與「源 / 流」的關係，使「西學中源說」有不同的意義和功能。他的版本重在平息漢人對《時憲曆》的質疑，而不在乎曆學的源流。梅文鼎則為「西學中源說」提供了完整的論述，使得中法西傳的過程看來更為可信。他以「同 / 異」為起點，甚至為不同曆法、不同文明與不同的宗教安排了適當的位置，只是中華作為源起，立於優位。

雖然康熙深信西法優越，但禮儀之爭（教廷禁止中國教徒祭祖和祭孔）日益加深，康熙懷疑傳教士的忠誠，並漸漸改變對待西學的策略。他利用來自不同國家傳教士間的矛盾，誘使他們更新算表和儀器；並編纂大部頭的曆書，把這些知識開放給漢人，卻不准以其內容入科舉試題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。

梅文鼎版的「西學中源說」則流傳在漢人曆算家之間。他以傳播論證明中法之古而優；且西人的技術，只是「禮失而求諸野」，無妨用之。同時滿足了西法乃國朝正統之權力意涵與修曆借取西法的需求。這也成為此後清代算家在禁教的背景下，合理化他們採用西方曆法技術，卻攻擊西方宗教的基本立場。